

红军老战士张鹏

张鹏，曾用名赵新政、张柄州，1921年6月出生，陕西省礼泉县水平乡王井村人，中共党员。他14岁参加红军，是一位平凡而又可敬的红军老战士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。

张鹏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幼年丧父。7岁时，正遇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大旱灾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未收，生活无着。母亲把仅有的五亩山岗薄地典当给别人，带着一家五口背井离乡，逃荒到山水县起家村。为了让孩子讨个活命，母亲痛哭一场，把张鹏卖给该村一家姓赵的地主当儿子，更名赵新政。

张鹏卖给赵家后，名义是儿子，实际是奴隶。他每天上山放羊，只带几个不够一顿吃的窝窝头，边放羊，边砍柴。晚上归来，把羊圈好就忙着给地主烧炕，打发地主入睡后，自己睡在冰冷的地上。一次，张鹏背上长了个大疮，发着高烧，地主不仅不给医治，还逼着他去放羊。他强忍着病痛上了山，结果因一时照看不周，一只离群的羊被狼咬了一口，吓得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很晚才回去。到家后钻到羊圈中隐藏起来，但还

是被地主发现了，遭到一顿毒打。棍子正好打在疮上，脓血直流，当场昏倒在地，无人过问。苏醒过来以后，几天不让他吃饭，还得照常放羊。

年幼的张鹏在赵家熬了6个年头。地主的为富不仁，激起了他的满腔仇恨，他时刻想着怎样摆脱这个封建牢笼。其族兄赵明是红军游击队的战士，对他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，不断在生活上照顾他，向他讲述贫苦农民只有跟共产党走，只有起来斗争，才能推倒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，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。1935年1月，张鹏14岁那年，在其族兄赵明的帮助下，逃出了虎口，到陕西省赤水县参加了红军游击队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张鹏入伍后，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关怀，他亲眼看到首长和战士们同甘共苦，亲如兄弟，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。他下定决心，永远革命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一切。1936年12月，张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张鹏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，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，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抗战时期在禹县同日本鬼子的一次战斗中，敌人用大炮轰击我军阵地，工事炸塌把我们的战士埋在土里，有的被压死，有的被闷死。张鹏被扒出来后，得了个脑震荡，但他仍不下火线，随军转战。还有一次和日本鬼子的战斗中，

我军把日军包围在孤城中，屡攻不克，于是搭上云梯，用炮火掩护攻城，连续上去四个战士，都中弹牺牲。这时身为排长的张鹏奋不顾身地爬上了云梯，敌人开枪射中他的下颚，把下巴都打掉了，弹片长在肉里（直到逝世也未取出）。之后我军大部队赶到，县城被攻克了。后来，他给亲人们说：“我是九死一生的人。”

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突围中，由于被敌人封锁，部队生活十分艰苦，晚上没被子盖，战士们互相抱在一起睡觉。张鹏身患疟疾，无药无食，发起高烧来，靠喝水降温，一次要喝五六碗凉水才会清醒些。首长眼看他一点也走不动了，要把他留下来交给地方，让群众把他保护起来，病好后再回部队，他坚决不同意。部队领导趁他在昏迷中，给他留了封信和一些钱，安排在老乡家养病。病养好后，派人把他接回部队。

张鹏参军后历任班长、排长、副连长，二十步校建委会总务股长、第五步校招待所副所长等职，先后参加过7次大的战役，荣获军级“八一勋章”“独立自由奖章”“解放奖章”各一枚。

1953年6月，张鹏因身体不适部队生活，转业到汝州市（原临汝县）工作，曾任县供销社供应部副经理、县医药公司经理等职。由部队转业到地方搞商业工作，是个大的转折，他到地方以后，继续发扬老红军战士的优良传统，

他那一心为公的革命精神，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，谦虚谨慎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张鹏到医药公司工作以后，坚持群众路线，事事依靠群众。他说：“我们医药公司是又采购，又供应，又生产，又加工的单位。我们的工作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健康，一点儿也不能马虎……”当时在药物管理上问题很多，很多药品包装不合格。特别是中药，大部分是树皮草根，由于房子少、院子小，保管不善，不卫生，不安全。他发动职工实行任务包干，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。他总是闲不着，天天带头打扫库房和院子。

张鹏还十分注意关心职工生活。职工有什么困难，他都了如指掌，总是尽量帮助解决。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他带领职工开荒种菜。这年冬天储备了6000余斤白菜、500多斤萝卜，职工们吃上了饱饭，安定了情绪。由于张鹏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，医药公司的面貌不断发生变化。

张鹏在长期的战斗环境中，学会了装被子、做衣服，他的生活十分俭朴，吃剩下的饭热了再吃，从不浪费一粒粮食。他经常向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他的四个儿子，有三个参加了解放军，在部队进步很快。

1985年7月3日，张鹏同志因病去世，享年65岁。

来源：汝州党史

汝州东关迎恩楼、迎风楼、来青阁的由来及名称演变

刘孟博

来青阁，明清时期又称迎恩楼、迎风楼，其旧址位于汝州市区郑宝路口西侧东关街祖师庙旁。来青阁历史上曾是汝州地方官员迎接管的重要礼仪性活动场所。皇帝有圣旨、诏谕送达汝州，或上级官员巡阅地方途经于此，或新官莅任，地方官员都要出城三里，在来青阁外列队迎接，谓之迎接管。汝州人在来青阁外迎接管官的旧制，兴起于何代，已不可考，然汝州自古为沟通秦晋楚吴之要道，许洛古道、宛洛古道皆穿州城而过。遥想往昔，过往商旅络绎，每岁途经于此的官宦士胥，亦当不在少数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来青阁这座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古迹，却在“抗战”时期被毁，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。汝州籍文化名士张绍文先生在其出版的个人诗集《张绍文诗选》中，就有一首描写来青阁的诗：“紫气东来古阁迎，苍松翠柏总青青。登高一望许都近，十里烟霞罩汝城。”如今的好古寻幽者，想要探知来青阁的过往，唯有借助于档案文献的些许记录，去了解来青阁及其附属建筑的历史嬗变。

提及来青阁，首先需要讲一下其所处的东关街。东关地区作为城市的外围延伸，汝州城的东大门，依托于交通的发达、通畅，自古商业繁华，通过阅读明代汝州学正任仪撰写的《重修备水渠记》一文，可对东关街的繁荣景象有一个初步印象。其文曰：“汝为河南名郡，城有门三，东曰仰京，西曰瞻洛，北曰望嵩。俱有关以附之，居民萃焉。西北二关事产差少，而东关自仰京门抵迎恩楼，几三里许，人物聚集，店设鳞次，商贾货于斯，行旅止于斯，士夫庐于斯，诚一州冠冕也。”

到了清代，随着南关街、西关街商业区的形成，原本喧闹的东关街逐渐落寞，其商业繁华程度已大不如前，街道长度亦有缩短。道光《直隶汝州全志·城关街道》卷三记载曰：“东关外东至吕祖阁为泰来街属东关，阁外属在一里。街中迤北为登封巷，至北东、西二路，属东关，其路北以西属水峪里，东属在一里，北属向一里。街自南往西有临隍口，中有青岭巷，东有鲁宝巷，俱南至东关，房舍后属在一里。又东门外有便径一道，口北至土桥，属东关，桥北属水峪里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东关街仅至现今的东关街中段（后毛庄口西），分界线为路中的吕祖阁，该阁为道光八年汝州知州董大醇，在明代乡贤张维新牌坊遗址上捐奉创建。据志书记载，张维新因政绩斐然，屡有擢升，时东关街及城内中大街均有为其所建石坊，分别为张给事坊两座、张布政坊两座，而东关吕祖阁旧址为其中的哪组石坊，已无从可知。

根据不同时期的档案文献记载，来青阁的名称及其附属建筑，在历代官府的不断修缮下多有变化，大致可分为迎恩楼、迎风楼、来青阁三个时期。

来青阁在明代称迎恩楼，恩者，即皇恩也，寓意为“恭迎皇恩”。古语有云：“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。”《国语·晋语一》曰：“孝、敬、忠、贞，君父之所安也。”君臣之礼，礼莫大于敬，在君主集权统治达到了顶峰的明代，利用语言、行为表忠心是臣子们最常用的办法。因此将汝州东关东门命名为仰京门，在城外的郊迎之地，设迎恩坊及迎恩楼，更多地是为了展示地方官员对皇帝的忠诚之心。经过查询，各地以仰京、迎恩为名的城门并不在少数，在韩国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观底洞亦有迎恩门一座，该门是朝鲜王朝时期国王亲自迎接中国明朝和清朝使臣的场所。该门旧名迎诏门，明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），明朝使臣薛廷宠来朝，他对“迎诏门”的名称发表意见说：“所迎有诏、有敕、有赏赐，而名以‘迎诏’，似偏矣。”于是题写“迎恩门”三字，作为该门的新名称。通过正德《汝州志》的记载，明代的迎恩楼建筑群，主要有迎恩坊、迎恩楼、观音堂、接官亭等构成。正德《汝州志·公署》卷四曰：“迎恩楼，在东廊门上。”正德《汝州志·寺观》卷四曰：“观音堂，在东关廊门外，今置接官亭于内。”

清代初期，来青阁曾易名为迎风楼，并祀以文昌帝君。迎风者，乃汝郡发脉于此，受气于东，故在此四方风聚象处，立文昌阁以应其祥瑞。同时迎风楼，亦有接风之意，仍不失其为郊迎之所的本职。

林中宝，字玉斋，辽东铁岭卫人，恩贡。清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六月，任汝州知州，在任三年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在经历明末之乱后，汝州境内的古迹名胜多毁于兵燹，或年久失修，知州林中宝与巡道范承祖曾先后重修学宫文庙、洗耳河桥、风穴寺、南禅寺、法行寺……东关迎风楼，作为汝州官府迎来送往的重要场所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因此重修迎风楼及其附属的接官亭、观音堂、玄帝庙，也显得尤为必要。

继知州林中宝重修迎风楼建筑群后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，迎风楼再次迎来了它的新一任重修者，知州章世麒的到来。清道光《直隶汝州全志·职官》卷二记载曰：“章世麒，字秋千，顺天宛平人。康熙六十年任，断断明决，培文风，赈饥民，舆情爱慕，有去思碑。”章世麒所撰《创修汝郡塔风、来青阁诸记》一文，对该次重修及缘何易其名为来青阁，有详细记述。“汝本周南地，北枕嵩少，崑山峙其右，三山列于左，颇擅形胜。独汝水东去，曾不回顾郡城，而郡城之巽方又无重冈峻岭以锁其流而收其气。善乎前人之谋，欲建浮屠于东南五里外，砥柱迴澜以锁其气，谓可以使富庶常保，而文教亦以蔚兴也。会以费浩中止，仅存其基。康熙壬寅，不佞来守是郡。询得其故，谋成厥工。周览相度兵燹之后，东城一带大半倾圮。郭之东极，向有迎风楼，上建文昌祠并元帝庙、观音堂，皆前人所说，以为锁郡郡城计也。今皆鞠为茂草矣。于是，先其近者，图其易者，而尝试之，经始于癸卯之正月。先于城东南隅，商之青鸟家撤旧钟楼之基，创建文峰塔。因治东城内外之倾圮者，建宾喝楼于东门之上，以逆生气。又即迎风楼旧基扩大而重建之，仍祠文昌于上。文昌，木德也，易其名曰‘来青阁’。东方者春，青阳来复，斯文明有象。”

雍正四年，来青阁建筑群发生了新的变化，那就是来青阁外的观音堂被易名改建成了先农坛，从此以后，这座观音堂再未出现于史料文献的记载。清道光《直隶汝州全志·祀典》卷五记载曰：“先农坛，在东郊来青阁外，拜殿三楹，拜台一方，院墙四围，门楼一座。雍正四年诏各县县衙立坛祀神农，每岁以仲春亥日致祭，并行耕籍礼。”

据熟知地方掌故的姚国旗老师介绍，听早年见过来青阁的老年人说，来青阁的下部为砖石垒砌的高大基台，正中开有门洞供行人车辆通行，基台的北侧设有台阶可以登顶。基台之上为楼阁建筑，样式与东关东门楼一样，均为重檐歇山顶，民间俗称“两滴水”，对比周边县市留存下的类似古建筑，与其最为相似的为洛阳鼓楼。关于来青阁被毁的具体时间，按照民间的说法为1944年5月临汝沦陷前，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为修建工事而拆毁，不过具体还有待考证。

来青阁作为汝州城重要的地标性古建，见证了上千年的封建官礼仪和无数的宦海沉浮，对中国古代礼仪和政治制度均有着重要意义。

和谐之美

黎新民 摄



老行当之修钢笔

□李晓伟

那时候的初中生，拥有一支自己的钢笔，那是很牛的事。

以至于拥有一支钢笔的人，从来不藏着掖着，直接把钢笔插在胸口的衣兜上，笔帽舌头别在外面闪光发亮，格外显摆。

钢笔也叫自来水笔，在现代书写工具中，凡是具有蓄储液体墨水装置采用金属笔尖、书写时应用毛细原理能使“墨水自来”的笔，统称为自来水笔。由于制造自来水笔笔尖的金属材料多采用钢片，又俗称为钢笔。

插一支的，是中学生；插两支的，是高中生。据说，这是当时分辨学生的一种方法。那么插三支的呢？不用猜，肯定是修钢笔的。那时候的初中生、高中生，谁没有用钢笔在自己的手腕上画过手表？那些没有钢笔的人，都要找有钢笔的人在手上画手表。不管画得圆不圆，表带粗不粗，总比胳膊腕上没有强。

钢笔稀缺，自然珍贵。拥有一支钢笔，就像拥有一段精致的人生。拥有钢笔的人，以钢笔来显示自己是识字的文化人。来到人前左顾右盼，自觉高傲几分。而那些没有钢笔又想显摆的人，会冒充性地插上一支笔帽上街，反正别人也看不见兜里的内容。

但是，钢笔是一种消耗品，经常使用，免不了“疾病缠身”。即便有病，人们也舍不得将其随意丢弃。有病得治，况且，原先修钢笔那也是有个技术含量的行当，不是懂得钢笔的人，还真干不了。于是，“钢笔医生”应运而生，修钢笔的师傅便成了它的救星。

那时，城里的每所学校门口，都会有修钢笔师傅的身影出现。

有人来修笔，修钢笔的师傅会像老

中医那样“望闻问切”，询问、检查、清理，找到钢笔的毛病所在，并要准确地查出病因，然后开始精心修理。

只见他像雕塑一样端坐在小凳子上，眼光直直地盯着手心需要修理的那支钢笔，一丝不苟地将其一一拆解，摆放整齐。他的身边是一个打开的箱子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边被一格一格分开，整整齐齐摆放着的各种钢笔零件。

其实，钢笔身上的零件不多，常见的毛病也就那么几种，无非是书写不通畅，甚至是不下墨水，或是笔帽坏了、皮囊漏了、笔身劈了。这些对修笔师傅来说，都是小菜一碟，手拿把攥，手到擒来。

书写不畅，也就是笔舌头堵塞，只要经修笔的师傅稍微一摆弄，出水就流畅了。笔尖叉了，下水不畅且容易把纸划破，师傅只是用手捏捏、用砂纸磨磨，用小锤子敲敲就能解决这些问题。皮囊漏了、笔身劈了，那就要更换新的。修理完毕，师傅会用清水把笔胆洗净，然后蘸了墨水，在纸上画画写写。感觉不满意，又重新拆下笔尖反复观察、琢磨，并再次打磨，直到让人满意为止。

修钢笔关键的技术是修笔尖，因为钢笔主要的用途是用笔尖书写，而修笔师傅水平的高低，也都体现在修笔尖的质量好坏上。钢笔根据笔尖材料成分的不同，可分为金笔、铱金笔两种。铱金笔的笔尖是不锈钢制成的，笔尖较硬，价格便宜；而金笔的笔尖是用黄金打造的，它弹性好，手感舒适，但价格昂贵。

这样的金笔的笔尖磨损了，就要找修钢笔的师傅镶金。这是修钢笔的绝活，叫“点笔尖”。接到这样的钢笔，修笔师傅就会把钢笔小心夹在一个模具当中，用喷灯熔化一根金丝，再用一根针挑起一点，粘到笔尖上，等到冷却之后，还要用细砂纸轻轻磨一番，并且让顾客自己试一试，提出问题还要进一步再打磨，直到顾客满意为止。

这样一支钢笔，自然价格不菲；修理这样的钢笔，费用自然不低。拥有这样一支钢笔的人，自然颇有地位。所以，修钢笔的师傅很是乐意接这样的“大活”，而修理起来也会格外用心。记得当时修理一下钢笔，也就是一毛两毛的事，但修理这样的钢笔则要一元两元了，这是很奢侈的事。

但人家那手艺，简直是在笔尖上跳舞。

一个技术高超的修笔师傅收拾、打理出来的钢笔，那笔尖落在纸张上，滑润得就像手触摸了婴儿的肌肤，让人惬意自如，行云流水，辞藻飞扬，心花怒放。

至于其他需要更换的部位，只要零件一换，也立马焕然一新。但是，其中存在一个小小的遗憾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彼时的钢笔，品种较少、颜色单一。牌子无非“英雄”“永生”，颜色也就“黑色”“墨绿”“枣红”，更换笔帽或者笔杆，有时会配套不全，那就只能凑兑了，然后就会出现“墨绿”的笔帽配“枣红”的笔身，或者“枣红”的笔帽配“黑色”的笔

身，好像一个人穿搭不合适。但只要能正常使用，没有人会嫌弃和笑话。

毕竟，能拥有一支钢笔，来之不易。当时，钢笔的广泛使用带动了修笔业的兴起，只要在百货商场文具柜台旁边，或是有学校、有学生的地方，都会有修钢笔的摊位。

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在学校门口、或者文具店门口，一位修钢笔的师傅坐在小桌前，手握小小的钢笔，熟练地进行修复。这不仅是一项手艺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是钢笔最为“高光”的岁月，凡是在单位工作的人，几乎都有一支钢笔。同时，为了满足别钢笔的方便，那时的男式春秋装上衣在制作时，还特意在上衣的口袋翻盖上开一个小口，以便抽取钢笔时顺手方便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写一手好的钢笔字，会被人刮目相看，高看一眼，甚至能带来工作和晋升的机会。

然而，时光流转，随着圆珠笔、中性笔等便宜方便笔的崛起，昂贵的钢笔渐行渐远，传统的修钢笔行业也逐渐式微。在历史长河的淘漉中，人们对于书写工具需求的变化，使得修钢笔的师傅们逐渐隐退、消失，留给人们的，是一种对往昔的怀念和曾经拥有的温情。

但是，这并非仅仅是一种行业的逐渐退出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改变，代表着人们对于书写方式的转变。悠长岁月中一系列传统行业的兴衰更替，也标志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和进步。

让我们一起温顾这些渐行渐远的老行当，去感受时光的变迁吧。